

LA DÉMOCRATIE

CONTRE

民主反对专家

古希腊的公共奴隶

Les esclaves publics
en Grèce ancienne

[法] 保兰·伊斯马尔 著 张竝 译
Paulin Ismard

LES EXPERT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La démocratie contre les experts

Les esclaves publics
en Grèce ancienne

民主反对专家 古希腊的公共奴隶

[法] 保兰·伊斯马尔 著

Paulin Ismard

张竝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反对专家：古希腊的公共奴隶 / (法)伊斯马尔著；张竝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687-3

I. ①民… II. ①伊… ②张… III. ①民主—政治制度—
研究—古希腊 IV. ①D75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6760 号



La démocratie contre les experts : Les esclaves publics en Grèce ancienne
By Paulin ISMARD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2015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1055号

民主反对专家：古希腊的公共奴隶

著 者 (法)保兰·伊斯马尔

译 者 张 竝

审读编辑 张培均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687-3/K · 490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　　言

遥远的雅典经验此时此地能否有助于我们对抗不良政治？

对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个体而言，政治很少会是个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长辈告诉他政治关乎想象和欲望，没有其他哪种活动能像政治那样让生命真正得到实现。他们通过话语和信仰传递的这些自身体验，说得好听，就像无法抵达的腹地，说得难听，就像难以破译的谜团。政治生活的舞台很久以来就已不再令他感兴趣，他也渐渐对种种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弃了它的整个表现原则。

他参与其间的政治话语已是危机重重，他发现那样的政治话语仍然只不过是些大话套话，轮廓很不清晰。在他看来，政治话语应该既是行动的准则，不会过时的愿景，也是民主的原则。当然，他的这个祈愿也具有双重目的。但只要他不像别人希望他做的那样，拒绝承认那是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每个人均可享有自由的唯一指望，而且反而从中听出了颇具激进意味的说法——权力平等分配的原则，共同体切实有效掌控自身命运——那他很有可能从中进一步看出唯一具有价值的政治规划：这样的指令尽管含混不明，但它不也将马德里太阳门广场、雅典宪法广场、华尔街祖科蒂

公园的那些示威者聚合到一起了吗？

不过，他仍然觉得在这萦绕不去的音乐之中，存在某种根植于日常的对民主理念的否弃，颂扬专家的统治地位，再三重申掌管公共事务的政府必须依赖于各个门类的知识，而且知识的本质要求它在吸收转化的时候必须远离公众的偏见。因此，普通公民由于被贴上了无知的标签（他们对何为国际经济法则、如何理性治理国家一窍不通），他们的言论便只能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而这种规避便构成了复杂社会内部的治理艺术。因为由所有观点构成的民众意见就算持续不断地得到考量与剖析，但从政治角度出发，对共同体全体而言有益的知识若由非专家平等商议而来，仍然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意见统治”与专家治理远未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它们是同一政治领域的一体两面，而政治却将普通公民集体构建政治技能的能力给否决了。正是由于日常对民主表达的剥夺，使他成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甚至不得不同意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死亡。

但执政专家这一形象只不过是与国家这一概念相关的极其古老的当代面孔，而国家生产的是有关社会团体方面的知识。因为无论保护还是不保护，无论要保障自由还是压制自由，在这之前，国家都具有官僚主义的特征，它首先就是知识机构的集合体，其目的就是要将社会视为一个物体加以构建，国家既与之分离，又使之具有某种形式。可以这么说，国家首先就是知识团体，是知识国家。

我们虽然自称是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后继者，但对该民主政体就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联所作的思考却相当陌生，注意到这一点，或许并非无益。我们相当熟悉的专家形象，凭借知识便可具有治理他人的资格，但事实上，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却对这样的观点极为陌生，对他们而言，专业能力本身并不会使对公民群体的统

治具有合法性。若是民主从本源上就与专家治理的形象相左，而且他们的国家观也与我们的相异，那就会相当有意思。而这就是本书希望深入研究的内容，我会追溯希腊诸城邦出现的世界上首批公职人员的历史，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扮演名副其实的专家角色。而这些人都是奴隶……

目 录

前言 / 1

引言 / 1

古代人、现代人与野蛮人的奴隶制 / 4

何谓公共奴隶制？ / 12

奴隶照耀下的城邦 / 16

第一章 起源 / 20

荷马笔下的 dēmiourgos / 22

奥德修斯的仁慈 / 26

多隆被处死 / 28

戴达洛斯，是 dēmiourgos 还是奴隶？ / 31

服务于公民共同体的异邦专家 / 36

僭主制，公共奴隶制的起源？ / 42

公共奴隶制，民主政制之子 / 47

第二章 城邦的奴仆 / 51

公民制度中的小职员 / 53

- 公共文书 / 55
公民印记 / 59
规训与惩罚 / 62
服务于城邦的匠人 / 68
为城邦服务的祭司？ / 71
获取奴隶 / 74
古典时代城邦的“公共服务”？ / 79

第三章 异邦奴隶 / 86

- 奴隶的肉身 / 88
享有特权的奴隶 / 91
拥有财产……与奴隶的奴隶 / 93
“血亲特权”？ / 98
“作为自由人” / 104
城邦的礼遇 / 107
作为公共财产的奴隶 / 111
dēmosios 的身份 / 115

第四章 民主制下的知识等级 / 121

- 奴隶与专家 / 125
民主认识论：普罗塔戈拉或吹箫者的城邦 / 136
政治炼金术 / 140
哲学家 dēmiourgos / 143
奴隶的知识有什么名称？ / 144

第五章 希腊国家的秘密 / 154

- 古希腊的国家问题 / 156

- 理想的奴仆 / 161
Polis 反对国家 / 164
谜一般的城邦体制 / 169
神的摹本与王的影子 / 173
无名的弟子 / 177
苏格拉底的幽灵 / 180
第一个基督徒：“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 182

结语 / 192

- 中立化的政治 / 194
制度的生与死 / 196
城邦的普通身体 / 198

书目 / 204

- 奴隶制的历史 / 204
公共奴隶制与王室奴隶制的比较 / 206
古希腊的公共奴隶制 / 209

引　　言

道路的主宰者，我背负着来到太阳底下，
我背负着进入雾中我背负着踏上
行军蚁的炭火碎肢之上。我背负着雨伞
我背负着炸药我背负着枷锁。
自阿卡德以降。自埃兰以降。自苏美尔以降。①

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

1861 年的雅典。并非温柔敦厚的奥托一世当政时期那个地中海年轻王国的首都，而是美国南部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彼时正如火如荼地投身至邦联各州的叛乱之中。那就应该称之为 Athens，而非 Athénai。18 世纪末，约翰·米利奇创建雅典城，想使佐治亚州新建的年轻大学享有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笔下城邦的美誉②，使

① A. Césaire, “阿卡德以降埃兰以降苏美尔以降”(Depuis Akkad depuis Elam depuis Sumer), Cadastre, Paris, Seuil, 2006, p. 37[1961 年第 1 版]。

② E. Merton Coulter, “佐治亚州雅典的奴隶制与自由, 1860—1866 年”(Slavery and Freedom in Athens, Georgia, 1860—1866), *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49, 1965, p. 264—293。

雅典成为插入占领区心脏的旧世界文化的前哨地带。尽管这名字起得好，但这座卑微的小镇却与原先蓄奴制南方的大部分城市没什么区别。城市居民 4000 人，奴隶就差不多有 2000。

自从南北战争爆发以来，旧有的蓄奴制已分崩离析。许多奴隶主由于无力蓄奴，只能一弃了之，结果城里的主干道就成了奴隶的聚集地。奴隶“像自由人一般”在公共场所闲庭信步，他们难道已不再是主人的财产不成？种植园时期的祖制已摇摇欲坠，惹得约翰·克里斯蒂愤懑不平，他是城里的日报《南方守卫报》的评论员：“全世界都知道黑奴（negroes）绝对就是奴隶，可他们事实上倒成了自由人，不仅不干活，还四处偷鸡摸狗。黑奴也要吃东西，可他们游手好闲，就是不干活。”当时引起轰动的是，为了阻断这种现象，市政当局最终出台法令，规定奴隶主每遗弃一个奴隶，就得缴纳一份税款，否则，奴隶就得离开这座城市。

美国蓄奴制历史上的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雅典便只能靠自己去获取奴隶。1862 年初，市议会聘请托马斯·科布将军的奴隶、男孩乔来“维护道路，负责照料城里的骡子”。而对这名奴隶的管束就交给了他的主人。但过了一年不到，科布将军在弗里德里克斯堡战役中阵亡，市政当局决定不给乔恢复自由身，而是摇身一变，自己成了奴隶主。男孩乔便在雅典这座小城当了近三年的公共奴隶。

雅典的这名奴隶养路工想必可以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里认祖归宗。亚里士多德在一篇论述他那个时代雅典政制的文章里也确实婉转地提到一个负责清理公路上的尸体及养护道路的人。^①和男孩乔一样，这名并未青史留名的“公职人员”也是雅典城邦的奴隶，而城邦就是奴隶主。这则轶事横跨两千多年，将伯里克利的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thenaiōn Politeia*)，50, 2。

城邦与它那卑微的美国替身结合起来,至今仍会混淆视听。乔和古代雅典的这位无名奴隶事实上隶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奴隶制结构,因为这在二十五个世纪之前的雅典卫城是一种反常现象,由特殊条件造成,而 1862 年的雅典却并非如此。

在古典时代的雅典,1000 至 2000 名公共奴隶要服务于由 30000 到 40000 名公民构成的共同体。希腊人在指称公共奴隶时,会用到 *dēmosios* 这个词。该词一向都有两层意思,既是指为城邦工作这一职能,又是指奴隶这一身份。前来希腊城邦的异邦人在此停留期间自然而然就会注意到有许多公共奴隶从事形形色色的工作。进入神庙,他会发现清点神祇财物的是 *dēmosios*,在有些场合下,他们甚至还会担任祭司这样的职务。到了公共广场上,一群负责维持治安的公共奴隶说不定还会训斥他一顿。而在城里的许多大工地上,他会见到公共奴隶正在竖立各种各样的纪念碑。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很明确:对那些成为城邦首批公职人员的人,古代文献持相对沉默的态度,丝毫未曾论及公共奴隶这一奇特体制的丰富性。

在这道风景中,有一个因素绝对会使我们的来客大惑不解,即有些委派给这些奴隶的工作非普通人能够完成,大部分公民也没这个能力。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存在一个特殊的关节点,即在雅典民主理想的核心深处,知识的等级与权力问题紧密相连。雅典的经验与对我们民主现状的深层诘问在此遭遇。我们的政治乱象——我指的是 2015 年的法国——其实有赖于一种信仰,其日常表现形式是这样的: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诉求与政府要求的效率原则无法相容,而效率原则这么复杂,自然就会用到知识。如此一来,对公共事务有用的知识就必然源自特定的学问,而那些有学问的人——君王身边各式各样的专家与顾问——便可以民主之名行操控之实。然而,对古典时代的雅典人而言,任何知识本身均无

法使对公民群体的统治合法化；如果说某些需要资质的工作委派给了奴隶，那恰恰是因为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的奴隶尚不至于对公民秩序构成威胁。

公共奴隶制阐明了希腊政治经验中的又一个基本维度，与民主体制中国家的地位有关。希腊城邦算是国家吗？回答可以说莫衷一是，如果从法律角度看，城邦的那些官员，或者说“公职人员”，由于是奴隶，而被排除在公民群体之外，因此至少可以认为城邦的管理与现代国家毫无共同之处。国家是否作为“管理机构”或单独的机关而存在，这是个问题，从这方面看，公共奴隶这一形象证明希腊城邦并不愿成为一个国家，而这正是雅典民主经验的根基所在。

古代人、现代人与野蛮人的奴隶制

史学家尽管是希腊奴隶制或公民政制方面的专家，却对古典时代或希腊化时代社会的这些参与者并不感兴趣。^①毫无疑问，大多数城邦的 *dēmosios* 只能代表全部奴隶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奴隶都只不过是些财产，并非自由民，既成不了公民，也不会获得异邦侨民的身份。但史学家的沉默也是意识形态及科学传统的产物，长期以来，这种传统就从种植园世界的殖民地角度看待希腊罗马奴隶制，而那种奴隶制与公共奴隶制截然不同。对古代奴隶制最早进行研究的学者其实还萦绕着新世界的画面。亨利·瓦隆(Henri Wallon)是狂热的废奴主义者，后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又成为瓜德罗普岛在立法院的代表。对他而言，废除殖民地

^① 除了 O. Jacob,《雅典的公共奴隶》(*Les Esclaves publics à Athène*), Liège, Champion, 1928。

的奴隶制就等于表明古代奴隶制是城邦道德堕落的滥觞，直到基督教来临，拯救它们于水火之中，情况才有好转。^① 瓦隆在他那本里程碑著作《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历史》(*Histoire de l'esclavage dans l'Antiquité*)的前言里写道：

古人的奴隶制！虽然追寻它要到古风时代，可它却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这景象实在怪异。一旦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就再也绕不过殖民问题的本质；我们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来个一次性解决[……]。希望维持现状的那些人求助于古典时代，给自己找理由。我们都看得出，他们说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②

事实上，无论是废奴主义者还是反对者，求证于古典时代都是他们的惯用手段。某些废奴主义者通过赞美希腊罗马人对奴隶如何人道来谴责贩奴的残暴。因此，回忆古人可以给现代人一个教训。但他们的那些对手也在古代社会寻根溯源，意图为蓄奴制永久化觅得合法的理由：希腊罗马世界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得付出代价，对整个伟大的文明而言，这么做虽然悲惨，但也难以避免。

吊诡的是，三十多年来，古代奴隶制与现代奴隶制的比较研究，以“拥护奴隶制的社会”这一课题，又迎来了第二春。芬利(Moses I. Finley)之后，研究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历史学家都已习

^① 关于美国某些史学家的情况，也可参见 P. Du Bois,《奴隶与其他物品》(*Slaves and Other O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13—18。关于古代奴隶制的历史文献，参阅 M. I. Finley,《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Esclavage antique et idéologie moderne*), Paris, Minuit, 1981[1979]。

^② H. Wallon,《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历史》,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8[1847], p. 5—6。

惯将两种类型的社会进行区分：一类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society with slaves，或蓄奴社会，slaveholding societies），奴隶的数量微不足道，仅限于某些次要生产结构的领域；另一类是“拥护奴隶制的社会”（slave societies），奴隶数量巨大，影响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在拥护奴隶制的社会当中，奴隶的定期更新对社会结构的再生至关重要。若诚如芬利所言，那货真价实的拥护奴隶制的社会就会极其稀少。史学家只能举出五个这样的实例：除了古典希腊与希腊化世界的某些地区之外，只有共和国末期的罗马与帝国时代初期的罗马、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安的列斯群岛及巴西算是名副其实的“拥护奴隶制的社会”^①。这样一份清单，大多数研究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史学家都会同意，从而无意中表明希腊文明的独特性。将著名的“希腊奇迹”倒转过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开创西方现代性的优势又再次回到伯里克利及柏拉图的同代人手中。

奴隶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古典时代及希腊化时代的城邦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作用。我们发现古代雅典的奴隶占人口的20%至50%，相当于50000至200000人，尽管数字相差巨大，却丝毫无法改变奴隶制是公民秩序的根基这一事实。^②而且，古典时代希腊的奴隶制有个特点，即奴隶市场相当重要，从而确保奴隶

^① 可特别参阅芬利的《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前揭，p. 11。N. Fisher 也采取了此种分类法，《古典希腊的奴隶制》(*Slavery in classical Greece*), Londres,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5, p. 3—4。

^② 数量估算更大的，参阅 R. Descat 与 J. Andreau,《希腊与罗马的奴隶》(*Esclaves en Grèce et à Rome*), Paris, Hachette, 2009, p. 72, 以及 T. Taylor, “相信古人：史前时期后期欧亚地区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数量与质量层面”(Believing the ancient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imensions of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in later prehistoric Eurasia), *World Archaeology*, 33, 2001, p. 27—43; 数量估算更少的(介于人口的15%至35%之间)，参阅芬利,《古典希腊的奴隶制》(*Slavery in classical Greece*), 前揭, p. 35—36。

人口可以持续得到更新,这远比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繁殖重要得多。将奴隶置于公民群体之外的做法是古典时代奴隶商品化的主要维度。奴隶是他人的财产,只有那人有权给他起名,奴隶从而也就丧失了原先的身份,而在纳入主人的家庭中时,却又无法得到新的身份。因此,奴隶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被排斥者,这种相异性的形象影响着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所有这些理由来看,古典时代的城邦——无论愿意与否,雅典都是这种理想的类型——肯定都属于“拥护奴隶制的社会”,正如芬利所说:“将古代奴隶制的历史综合起来看,便会发现那就是希腊罗马社会史。”^①

在简单描述希腊奴隶制种种形式的时候,“拥护奴隶制的社会”这一概念不管有多恰当,它适用的那些社会的范围却仍然值得商榷。新世界奴隶制尽管在记忆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事实上它都无法掩盖这一普遍现象具有的极大差异性。三十多年来,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不断地揭示奴隶制结构的丰富性与极端多样性。^②从大湖地区的易洛魁人到爪哇岛,从这种

① 芬利,《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前揭,p. 35—36。

② 非洲学领域内的几个基本阶段:C. Meillassoux(主编),《殖民时期之前的非洲奴隶制》(*L'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Paris, Maspero, 1975; I. Kopytoff 与 S. Miers(主编),《非洲奴隶制,历史与人类学视角》(*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7; J. R. Willis(主编),《穆斯林非洲的奴隶与奴隶制》(*Slave and Slavery in Muslim Africa*),Londres, Frank Cass, 1985; S. Beswick 与 J. Spaulding(主编),《奴隶制的非洲体系》(*African Systems of Slavery*),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10; P. E. Lovejoy,《奴隶制的演变:非洲奴隶制的历史》(*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³; 东南亚著述:A. Reid(主编),《东南亚的奴隶制、束缚与依附性》(*Slavery, bondage and dependence in Southeast Asia*),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3; G. Condaminas(主编),《依附的极端形式:试论东南亚奴隶制研究》(*Formes extrêmes de dépendance. Contributions à l'étude de l'esclavage en Asie du Sud-Est*),Paris, EHESS, 1998; I. Chaterje 与 R. M. Eaton(主编),《奴隶制与南亚历史》(*Slavery and South A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转下页注)

依附与剥夺的极端形式来看,奴隶制其实是一种规则,而非例外。^①从这个方面看,1926年日内瓦公约对奴隶制所下的定义“个体的状态或条件具有财产权属性或其中几种属性”^②就很不全面。它按照殖民地世界的经验,以财产问题为准绳,却对施行奴隶制的大部分社会视而不见。

事实上,拥护奴隶制的社会这一概念并非古典时代与新世界社会的悲惨特权(况且,和废奴主义者的言论一样,它们也并未为西方所垄断^③)。15和16世纪之交,葡萄牙人深入刚果王国的时候,100000多个奴隶构成王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充斥在所有的生产领域中。三个世纪后,在乍得湖西南部索科托哈里发国广袤的领土上,加起来的奴隶比美国的还要多。^④所以,在非洲,大型穆

(接上页注)Press, 2007。综合论述:L Kopytoff, “奴隶制”(Slave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 1982, p. 207—230; O. Patterson,《奴隶制与社会性死亡:比较研究》(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 Meillassoux,《奴隶制人类学:铁腹与银腹》(Anthropologie de l' esclavage. Le ventre de fer et d' argent), Paris, Puf, 1986; A. Testart,《奴隶、债务与权力:比较社会研究》(L' Esclave, la dette et le pouvoir. études de sociologie comparative), Paris, Errance, 2001。最后,必须提及公共奴隶或皇家奴隶研究方面的两本关键著作:主要研究的是19世纪的卡诺酋长国,S. Stilwell,《权力的悖论:卡诺奴隶骑兵与索科托酋长国的皇家男性奴隶制,1804—1903年》(Paradoxes of Power. The Kano "Mamluks" and Male Royal Slavery in the Sokoto Caliphate[1804—1903]),Portsmouth, Heinemann, 2004;关于突尼斯大公的奴隶骑兵,参阅 M. Oualdi,《奴隶与主人:17世纪至1880年代突尼斯大公的奴隶骑兵》(Esclaves et maîtres. Les Mamelouks des beys de Tunis du XVII^e siècle aux Années 1880),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2011。

^① 参阅A. Testart的统计,《奴隶、债务与权力》,前揭,p. 176—182,以及他就奴隶制概念所提出的定义问题所作的总括性陈述,p. 115—136。

^② 条款1.1。

^③ 关于这一点,参阅P. Lovejoy的评论,“非洲奴隶制”(Slavery in Africa),见G. Heuman与T. Burnard(主编),《劳特里奇奴隶史》(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Slavery),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43。

^④ P. Lovejoy,《奴隶制的演变》,前揭,p. 24与p. 120—123。